

人工智能的民生伦理审视^{*}

李 谧

【摘要】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问世,人工智能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样式,双重地影响着民生境况。从民生伦理视角审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会引发诸多民生“恶”,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伦理批判性。然而,从辩证思维入手,不难发现人工智能将通过推动社会制度的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变革生产关系、增加自由时间等方面来增进民生“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运用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推进人机协同发展机制,令人工智能赋能、赋智于国家善治、智慧社会发展,从而渐入民生“善”的佳境,为求解人工智能伦理困境、推进人的善的生活范式贡献东方智慧。

【关键词】人工智能 民生“恶” 民生“善” 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李谧,法学博士,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21)05-0057-11

民生问题关涉民众的生存、生计与生活问题,本质上是伦理问题。“民生问题不仅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伦理道德问题……以关注和改善人的‘生存、生命、生活’为价值旨归的‘民生’话语,为民众所诉求和执政党所尊重,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民生伦理。”^①民生问题不仅受到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而且受到一定的伦理秩序和社会制度安排的制约。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在推动世界经济新发展的同时,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人的存在样式,同时引发人们对伦理秩序与社会制度的反思。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引入了智能时代,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正与负的双重影响,民生“恶”与民生“善”的境况现实性或潜在性地存在着。人工智能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挑战与机遇的二重景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把握好这一发展机遇,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探讨。”^②如何审视人工智能的民生伦理新课题,并探寻向善的求解路径,成为引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人工智能发挥正能量的价值导向。

*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重要论述研究”(20LLZZC069)的阶段性成果。

① 陈进华:《民生伦理:关于民生问题的伦理学诠释》,《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99页。

② 习近平:《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共同推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人民日报》2018年9月18日。

一、人工智能引发民生“恶”的道德解析

人工智能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提升人们生活便捷度的同时，蕴藏着诸多影响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威胁与挑战，致使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质疑人工智能的正价值，甚至得出人工智能会使人类走向“终结”的结论。这一切都引发人们思考：人工智能会不会引发人的生存危机、生活危机乃至发展危机？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正在给人的存在与生活带来难以预估的复杂性风险，从这一视角考察，它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伦理批判性。

（一）人工智能催生了劳动者的异己力量

马克思早已预见到机器对劳动者的影响。在工业时代，他就指出机器作为劳动者的异己力量，与劳动者形成对立格局，从而充当着制造民生“恶”的手段。“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①机器在解放人的体力劳动时，也将劳动者推向了机器的对立面。自动机由多个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工人被当作自动机器体系中的有意识的器官予以利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自动机作为工人异己的力量而发生作用，这便是科技进步后人之异化的生成逻辑体现。由于自动机的作用，有生命的工人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被配置到机械体系的诸多点上，成为机器体系总过程中的一个要素。

自动机与人工智能具有同一本质，成为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因而自动机升级为人工智能的内核。资本逻辑与科技的耦合，使得科技成为劳动者的异己性力量和对立面的伦理境况，呈现出多次“升级”态势。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霍克海默、布洛赫等哲学家均从伦理视角论述过科技发展对劳动异化的作用。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使得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布洛赫同样认为，“科学以及现代技术那种已经受到资本主义歪曲的合理性，使得纯粹的生产力失去了它的纯洁性”。^②科技并非完全价值中立，在不合理制度下，它已经构成了对人的宰制。

进入智能时代后，人被贬低为“机器”，机器成为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并使人同步进入新的更复杂的异化状态。作为颠覆性技术的人工智能，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超越之处便在于“智能”，因而成为一次革命性突破。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杰瑞·卡普兰（Jerry Kaplan）的界定，人工智能是人造机器智能，是合成智能（synthetic intellects）与人造劳动者（artificial labor）融合的结果，未来有可能朝向自主智能体（autonomous agents）迈进。人工智能因数据算法能力的变革而具备了类似人的智能的特点，成为典型的仿智能成果，它充分遵循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逻辑规则，利用了编码逻辑规则的计算机语言来模拟人的意识，是人类电子技术进步的标志。正因为如此，智能科技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的异化与物化境况。当智能技术具有了自主性“逻辑”或自我“意识”之时，它便以自己的尺度和功能施加于人，背离人的意志，摆脱人的控制，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显性或隐性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与工作。

随着科技与社会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导致了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成为令人类沮丧的难题。“智能技术与资本的联姻不仅加剧了数字鸿沟、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加剧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的‘外在的不平等’，而且正在酝酿一种更严重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②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内在的不平等’……可能造成一种新的生命权的不平等。”^① 世界性的贫困风险、不公平、不合理民生“恶”样态，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而愈演愈烈，其根源正在于智能科技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联姻。一些精英群体可以通过先进科技实现基因修复、基因增强或芯片植入、人机一体化等强大功能，从而令自己及后代实现健康、无疾病甚至长生不老的奢望，使得人类社会面临更严峻的问题。“数字穷人”“弱智能化”均可能成为智能科技在不公正、不合理制度下，人类面临的“新异化”危机和“人的存在”风险。时间异化、空间异化、社会异化将成为智能科技引发的新型异化，直接威胁人类社会的公正价值。“社会时间结构批判，社会加速驱动力批判，以及加速异化后果批判，是未来批判理论最值得发掘的可能主题。”^② 资本逻辑所驱动的“加速社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加速、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从而带动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社会分化加速、人与自身之异己状况加剧。

（二）人工智能导致了劳动力价值的贬值

机器使得人的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机器对人工的取代，使工人家庭中男女老少都受到资本的统治，劳动力价值被贬值，这个贬值是机器造成的。马克思指出：“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③ 未成年人的身体受到了摧残，未成年人成了创造剩余价值的机器，他们的智力被闲置起来而走向荒废。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科技使劳动力价值贬值的状况不仅未得到实质上的改观，而且在资本与科技的联姻下，资本家变得更加狡猾，其剥削更加隐蔽。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民生“恶”。机器在使劳动力直接地贬值时，也使劳动力再生产其日常所必需的商品更加便宜，从而间接地加剧了劳动力价值的贬值。宾克莱指出：“马克思对于我们今天的吸引力乃是一个道德的预言。”^④ 马克思主义早已揭示了资本逻辑的非道德性，并预言了道德的应然态：公正地对待劳动者的劳动，而不是增添失业与贫困。

人工智能与资本逻辑的耦合，导致了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人工智能承担着愈来愈多的以前被判定为“人类专属的工作”，使得仿生智能与人的智能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人被大量地替换下来，因而变得日渐贫困。我们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日益发达的科技将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而广大的中产阶级愈益回归为无产阶级。“2007年，欧洲南部数百万人失业，两位数的失业率至少能让未来两代人的希望破灭……财富在最富有的阶层和其余大众之间的不平等加剧，公众已经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游戏正在暗箱操作侵害他们。同时，许多类型的经济，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却在平等分配财富上更为成功。”^⑤ 在“暗箱操作”的行为中，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生物技术和智能技术替换正在工作着的人。智能科技加速发展，结构性失业大军会如潮水一般再度涌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比其他国家的学者看得更清楚，资本逻辑造就了今天世界上民生“恶”的状况。

信息化与智能化的科技正在获得日益强大的“仿生智能”。在智能时代，资本与科技的结盟使得缺乏技术的人员不断地贬值。职业悲观论者预测，人工智能将使人类最终全部失业。尽管这有点危言耸听，但诸多工作只有“进化”后的人工智能才能胜任，以便保证劳动能力与劳动效率成倍地加速跃升。一些机械性的、重复性的、肮脏的、有毒有害的、高危险的工作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机会，

① 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第126页。

② [德]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455页。

④ [美] L. J.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马元德、陈白澄、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6页。

⑤ [英] 乔治·扎卡达斯基：《人类的终极命运》，陈朝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页。

而且那些专属于人的职业，如警察、律师、医生、诗人、画家等，也被人工智能所挤占。正在异军突起的无人驾驶、无人商店、无人工厂、无人银行等，成为人工智能的专属性工作领域。工作的自动化、智能化加速了劳动价值的贬值。由于资本对利润与效率的追逐，“无人化”的“数字工人”或“虚拟工人”正日益受到青睐，使得人同时丧失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拟人化”的工作使得现实的人的“被剥削”变成了一种奢望。“这比被剥削更糟。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被剥削的好时光。因为至少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①一种被社会所拒斥的“非存在感”取代了资本家显性的剥削感，这被卡斯特称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它比马克思所揭示的显性剥削更“恶”、更不人道。

（三）人工智能撼动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人的主体性地位通过人为自身赋予意义而实现。生活世界是有意义的世界，其“意义”正在于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特质。正因为人建构了自为世界，实现了人自身的发展，人的“生活活动”才与动物式的单纯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马克思曾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②人通过主体性属性，可以创造美好生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形式逻辑系统”无法让人们获取意义。人们通过语言使用而定义意义，通过社会交往实践而建构意义。原本，我们“无法为计算机编程让它理解意义”，^③因为计算机语言与人类语言截然不同，人类不需要先验地定义事物便可以有意义地进行语言交流，而计算机采用形式语言编程，因而无法理解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的意义。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赋予计算机以“智能”，对人工智能嵌入有效的信息系统，使之能够理解人类语言的意义，于是计算机将由单一客体转变成成为社会主体，并与人类社会构成无间联系。在此意义上，作为“人造生命”的人工智能便可以进行有目的的人类实践活动，从而获取了“意义”主体地位。

在文明史中，人机关系以主—客体关系呈现出来，机器长期以来是人对象化的产物。然而，随着生物技术、智能技术的演进，人机关系不再单纯，甚至发生了主客倒置的转变，人工智能反客为主，成为主宰人类社会、改变世界的主体，并且被赋予了专属于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人机关系风险日益显现。“人类中心主义”地位开始动摇，人类“傲慢与偏见”的优越感将受到否决，人机间的矛盾与冲突难以完全避免。智能科技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出来：“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害怕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机器。”^④人的“身份”，甚至“人格”“人权”这类民生高级范畴均受到威胁。

当能动性被赋予智能科技后，人工智能便衍生“自由意志”“信仰”“爱”与“德性”等属人性的功能。知性人工智能是更高级的智慧体，它具有独立的计算能力，可自主决定并收集信息，甚至可以脱离人的安排而自主感知现实，并与现实世界进行交往，具有学习、进化、发展能力，可以比人类更轻松地掌握人类文明的所有知识，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当人工智能具有完全自主性，具有极强的认识与实践能力，并可以实现对其硬件装备的支配功能，进而衍生出改变环境的能力，此时，智能体便进入“制造和使用工具”、制造机器的主体阵营，进而可能成为决策的制定者和施动者，从而对民生施加影响。超级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它可以自行规避人类制定的各种规

① [美] 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③ [英] 乔治·扎卡达斯基：《人类的终极命运》，陈朝译，第294页。

④ [美] M. W.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则，最终使社会财富与社会资源围绕其自身目的运转。这无疑将构建单一目的资源分配新秩序，为资本剥削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如果这种人工智能再具备如有机生命一样的繁衍能力，就会构成自我扩张的发展态势，在此情境下，人或许可能成为它的“宠物”。具有自由意志的超级人工智能正如一个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在智能爆发的前景之下，我们人类就像拿着炸弹玩儿的孩子……尽管我们把炸弹放到耳边能够听到微弱的滴答声，但是我们也完全不知道爆炸会在何时发生”。^① 未来民生风险有多大，其复杂性难以预料。“如果我们像贸然引入核裂变那样贸然引入人工智能，恐怕全人类都无法存活下去。”^② 倘若宇宙间存在一种与人类的生存不兼容的高级力量，并做出人类意识不想做的行为，那么人类将面临着无法估量的民生风险。科学家们忧虑人工智能将以“新物种”形式取代人类，会终结人类文明，造成灾难性的民生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也担忧人工智能通过掌握海量财经数据操控世界金融，动辄对他国或他人进行经济敲诈或利益盘剥，演绎机器版的“法西斯统治”，进行种族灭绝的非道德行为，给人类造成惨重的后果。

二、人工智能促进民生“善”的逻辑理路

运用辩证思维，我们不难发现人工智能在引发生民“恶”的同时，必然蕴含着推进民生“善”的内在逻辑。

（一）人工智能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来增进民生“善”

当蒲鲁东主义者把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定义为一种“祸害”时，恩格斯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指出工业与科技的发展将提升劳动生产力，进而为消灭阶级、满足全体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人工智能的辩证视角。马克思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阐述唯物史观时给予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很高的评价，指出其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性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将引发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从而促进革命力量的壮大，工人阶级代表着新生产力，担当起改变旧世界的使命。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无疑将加速不合理制度灭亡的进程。

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智能革命推动生产力革命，使有效解决人类社会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公难题成为可能。可以说，整个一部人类发展史，正是试图解决资源短缺与分配不公问题的历史，诸多战争与竞争均与争夺资源勾连起来。人工智能的深入应用将加速生产的循环和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从而使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这将大大降低实体制造的成本，使其再生产的边际成本日益趋向于零，更丰富的产品将被制造出来。不仅如此，人类文明受到资源稀缺的约束，哪里有资源、如何获得社会资源，人工智能可以扮演一个“先知先能”的角色，回应人类的诉求。加强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合作，可以不断提升人类整体社会生产力，为获得更丰饶的资源、解决资源分配不公问题铺设平坦的大道。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提升生产力，而且能够抵御因资源问题而引发的贫困、不当竞争甚至战争等各类人为风险。

人工智能本身便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将促进更高一级生产力的发展。从科技史上考察，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总是对前一次的超越，都提升了整个人类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正是在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规律之下阔步前行的。关注智能化

① [英] 波斯特洛姆：《超级智能》，张体伟、张玉青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28页。

② [美] 詹姆斯·巴拉特：《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阎佳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进而推进生产关系的不断升级,必将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使人类社会不断向更高级、更美好的阶段进发,“人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必然成为幸福生活的现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对机器生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充分的论述。机器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将与活劳动一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是劳动力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它完美地融合了生产力的“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两种要素,构成了“智能生产力”。智能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会使得更少的活劳动便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产品,而不断丰富社会财富会为增进民生福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①通过智能技术的发展促进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必然会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 人工智能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增进民生“善”

人们生产人工智能这种拟人化工具,不只是在生产物质产品,更重要的是在生产生产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辩证法在看到事物肯定性一面的同时,也看到了事物否定性的一面,包含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就可以理解其必然灭亡的趋势。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灭亡,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胜利。

作为“虚拟人”的人工智能是劳动的对象化产物,是对物的创造产品,反过来又加剧了劳动异化过程和颠倒过程。但这种颠倒只是暂时的历史必然,这一过程本身又在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促进更高级的生产关系的确立。人工智能的巨大威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正在以指数级速度快速发展,其对人类社会的形塑与变革同样是颠覆式的,不仅推进着智能经济的崛起,而且建构起整个社会的智能化运动架构,催生着人的智能化存在模式。人工智能与资本逻辑联手,正在使这个异化走向灭亡,预示着生产力的变革将促进新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其目标指向民生“善”的社会关系。“在未来一个由人工智能担任国内和国际经济指挥者的时代,意味着我们所知的经济自由和资本主义的终结。”^②无论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世界经济的指挥者,科技的发展必然促进生产力的提升,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适应更高的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通过变革政治制度与分配关系来实现。资本来到智能时代,使人与人之间变成冷漠的互斥关系,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科技和科学主义理念,早已将人文关怀置于其视野之外。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是“价值无涉”的,人类必须审慎确立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的价值原则,将道德“善”确立为其研发的内在维度,以便人工智能体可以通过“道德图灵测试”(MTT)以“越过人们在特定伦理问题上的分歧”,^③确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人机关系,秉持一种尊敬生命、尊重人格、理性、友好的价值理念,开展具有温度的人工智能研发而非简单否定科学的新发现。“无论令我们惊恐的科学新发现是什么,那些否定这个发现的策略都不可能长久。”^④由于人机能力具有难易互逆关系,故而有必要追求一种互补与协同的人机关系:人的“弱项”或“短板”交由人工智能去承担,而专属人的本性的、合乎人的价值与意义的活动则复归于人去完成。这恰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强调的“各司其职”,从而实现“人为人事”“机司机职”“各显其长”“各得其所”的人机协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0页。

② [英] 乔治·扎卡达斯基:《人类的终极命运》,陈朝译,第297页。

③ [美] 温德尔·瓦拉赫、[美] 科林·艾伦:《道德机器:如何让机器人明辨是非》,王小红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

④ [美] 帕特里夏·丘奇兰德:《触碰神经:我即我脑》,李恒熙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关系。基于智能体系创建符合属人特点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价值理念和治理体系，可以助力智能经济突破发展瓶颈。如此，通过改善人机关系而改善人的社会关系，让人在和谐社会关系中形成体验生活、进行创造性活动、享受幸福的民生样式，从而超越货币拜物教式冷冰冰的社会关系，指向人文关怀的良善社会关系。

（三）人工智能凭借增加自由时间而增进民生“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一文中界定了自由时间。他认为，自由时间包括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由时间是人类社会由必然走向自由的结果，是经济社会高度发达后的生活资源。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为人获得自由时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重大的技术变迁会导致社会和经济的范式转换。”^① 农业革命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工业革命同样改变了社会结构，创造了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与企业家取代了贵族与地主，使得资本可以流向它想去的地方，通过投资可以生产更多产品，从而使得人们更加富有。智能科技革命无疑将在效率与精准度上更胜一筹，人工智能可以承担人无法胜任的工作，从而颠覆性地推进社会经济的范式转换。真正的经济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节约就是在发展生产力，一方面提升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又会促进消费资料的增加。消费能力是消费的先决条件，而消费能力的提升又是个人才能得到发展的外在表现。在此意义上，消费能力的提升也便是生产力得到发展的表现。因此，“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② 从节约人的时间视域出发进行人工智能研发，无疑将为人拥有自由时间、享受幸福生活贡献力量。

马克思曾描绘过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的生活境况：“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每个人都得到自由，从而过渡到充分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境界。拥有自由时间的幸福生活时代，正在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而历史性地发展着，并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切近。在未来美好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生活成为一种艺术活动。人工智能朝着民生“善”方向前行，必将为人节约劳动时间，从而助力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消除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异化，重建劳工体系，令人、机“分而治之”，让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时间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智能革命透过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可以实现自动化生产与服务，令人摆脱“苦役”的束缚，获取自由发展的时间与空间，进而从旧式分工中解放出来。这会从整体上大大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祛除马尔库塞式的“单向度的人”的片面发展境况，摆脱人工智能引发的人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困境，使人从繁重的体力与脑力劳动中“卸担”，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所指称的“劳动解放”。

三、构建人工智能增进民生“善”机制的中国智慧

“人与机器（物）”的矛盾与冲突，需要回归到“人与人”之社会交往关系并加以调整，方可获得根本性求解方案。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集中体现于一定的社会制度。人工智能本身并非道德主体，尚不能辨别善恶美丑与是是非非，它必然依托于现实的社会制度，“因为我们的

① [英] 乔治·扎卡达斯基：《人类的终极命运》，陈朝译，第2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0页。

思想和行动通常会受限于当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① 建构具有伦理责任的良善机制，增进人工智能的民生“善”效应，遵循人工智能的辩证逻辑，将其引向通往未来美好社会的彼岸，唯有在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的社会制度下方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人工智能与人民幸福相统一的优越制度，因为该制度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② 与之迥异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是以“资本逻辑”和“资本家利益”为中心的。为了维护这个中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打压甚至采取各种方式制裁新兴市场国家在技术上的发展，以确保其科技领先和价值增殖的“永恒”地位。正是这种理念，使得当前人类在数字鸿沟的非公正待遇之下面临的贫穷与疾病的世界风险愈益凸显。“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将从根本上解决人工智能作为机器与劳动力相对立的问题，使得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达成一致。人民群众是财富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是美好生活的实践主体和享受主体，确保了人工智能的“智能服务器”角色，而不是成为人的控制者、主导者乃至替代者，从而令人失去应有的主体资格。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提倡的“人工智能增进民生‘善’”的理念，成为马克思主义民生伦理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创新版，构成人工智能增进民生“善”的中国智慧。

第一，运用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为民生向善提供根本动力。在生产力要素中，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两大要素是关键。对于劳动工具而言，我们强调提升科技能力，走科技强国之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③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在今天日益显示出其内在魅力，信息化推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也预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提供了重要机遇。科技是核心战斗力，我们需要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为民生发展提供最先进的工具。人工智能正在推动我们走向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之巅，它在本质上有别于前三次科技革命。智能机器可以处理基因数据，并找到更便宜、更有效的疗法，从而会使人们享受到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会在各领域促进科技创新，生产各种可再生能源、更安全的食品，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甚至可以推进太空探索。绝不能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到民生就业问题就采取“去技能化”，更不能走“技能错配”的道路，而要走一条“人与机器赛跑”和“人与技能赛跑”的道路，充分掌握新技术操作技能，走在时代前沿。通过提升劳动工具的技能化，反逼人才的尖端化发展，提升人的创新力、把控制力与对机器的统治力，以维护人的主体性地位，而不是沦落为“后人类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渐进造福于人民的价值取向。人工智能是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科技发展的驱动力。应该经由智能革命推进整体社会生产力革命，为社会提供充足的生产与生活产品，构建智能科技引领的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不断满足人民对公共物品的需要，为消除贫困提供动力保障，并实现人民各项权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资本增殖，而消除贫困与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并不构成其主要目标，这是由该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我们大力提升智能科技生产力，吸纳智能科技产生的强大结构性力量，为增

①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4页。

进民生福祉提供坚实的内在驱动力支撑。

第二，优化从业结构与促进就业岗位升级换代，走人机融合、人机协作发展新路径。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利于推进从业层次的提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数字技术的发展太过迅速，以至于组织与运用技能以提升劳动力素质的速度未能跟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被抛在后面。早在1930年，凯恩斯就对新技术带给人们的影响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正在被一种新型疾病所折磨，一种某些读者甚至没有听说过名字的疾病，也是他们将在未来不断听到的疾病，那就是技术型失业。这意味着，我们发现节约使用劳动力方法的速度超过了我们为劳动力寻找新用途的速度，失业因此产生。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失调阶段。”^① 这清晰地告诫我们，失业的重要原因在于工业技术发展的速度失控，我们尚未为此做好充分准备，因而呈现为一种暂时的失调状态。从长远看，这一暂时性问题的解答，必将优化从业结构，极大地推进马克思所指明的“人类自身的劳动解放”、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人类劳动解放、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是具有超越不公正、不合理社会制度性质的转变，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无疑将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变革后的社会制度必将指向民生“善”。合理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中国梦的实现，可以使人们拥有更丰富的闲暇时间，以从事科学创作、艺术创作与欣赏、文化生产与消费等文化精神活动。这正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涵，是解决不充分发展问题后的更高境界。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在人工智能运用中必然会提升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推进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面对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矛盾，解决的路径依然是使其由对立状态走向统一状态。“自动化可能让一些人丢掉了工作，但是在中长期也提供了更多的薪资和更有趣的工作机会。”^② 在智能时代，传统产业正在让位于智能产业，从而酝酿着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大调整，“技术性失业”成为智能时代失业的新特征。人工智能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的冲击，但这为我们在经济发展上“调结构”、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最现实的依据。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民生发展上的自信表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③ 面对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做好了准备：深化就业领域的结构性和技术性改革，推动传统职业形态向数字化职业转化，全面提升就业质量，加强人机融合、人机协作，促进就业岗位升级换代，逐步优化就业结构。

应将人机协同机制引导到促进民生“善”的轨道并加以严格规范。人机关系实质上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是主客体关系，否则便会产生人的主体地位的“新异化”，人反被仿生人类所主宰，人类社会将步入“后人类”时代，这便是人类发展科技的悲剧。“由于AI具有被动性，AI的发展必须经过人的努力，所以AI伦理应该引导和规范这种努力”，^④ 技术与算法的优势只能居于与人相对应的“客体”地位，服务于人民的生活，不能因其算法优势而忽略了对民生“善”的追求。面对人工智能潜在民生“恶”的风险，我们要思考通过人工智能与劳动力之间的双向建构，加快人才的自身进化步伐，广泛培育以智能技术武装的、具备智能社会特质的时代新人，在此基础上推进“人

① 转引自 [美] 约翰·马尔科夫：《与机器人共舞》，郭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② [英] 乔治·扎卡达斯基：《人类的终极命运》，陈朝译，第254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4页。

④ 陈小平：《人工智能伦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路径：六个议题及其依据》，《哲学研究》2020年第9期，第84页。

机融合”“人机和谐”的同构路径，以便全面提升“人机文明”的新型人机关系，从而促进“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民生发展态势。

第三，以“人工智能+国家治理”创新范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为实现人民幸福梦想奠定坚实的基础。构建“人工智能+国家治理”范式，为增进民生“善”提供智能服务，必然成为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发展态势。“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至少在资源丰富、共识达成、充分回应等方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重要助力”。^①将人工智能赋智、赋能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把握智能革命中最关键的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以算法为核心，借力于算力，重构和创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创新国家善治的智能进路。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构成“众智成城”的集聚，使各治理主体融合到整个社会治理之中，形成合力，从而提升问题识别与综合治理的精度、准度、效率。数字经济便是国家治理中经济与智能技术融合的产物。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而且人工智能正在深度变革各行各业。^②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信息集聚，推进协商民主的实现，增进“共建、共治、共享”的主体性效能，搭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平台，提升政府回应民众诉求、实现公正权益的能力。促进人工智能成为广泛应用性技术，为整个社会向智能共存的智能社会转化提供技术创新支持。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的合力加持会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创新治理范式的形成，加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必将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

在借助人工智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充分考量人工智能对人的国家治理主导性地位的取代、治理进程对数据算法与算力的过度依赖而滋生的算法霸权与数据主义等价值偏向的风险，并加以合理应对。

第四，合伦理性地运用人工智能赋值于智慧社会建设。智慧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目标之一，是民生改善的宏伟蓝图之一。智慧社会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它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从“智慧”视角解析，“智慧社会是人类集成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一种以‘智慧管理器’为中介系统的智能化社会活动场域和自主回应型社会运行样态”。^③人工智能无疑将赋值于美好社会善治，无论是立足于大数据所构成的弱人工智能，还是与脑科学、生物技术、基因技术等构成融合态势的强人工智能与超级人工智能，均将推动现代社会的智慧型转化，成为科技引领人类走向美好社会的民生范式。数字农村与数字城市建设便是智慧社会的重要内容。民生事业要从农村起步，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中国新时代智能科技与创新社会治理高度融合的实践活动。面对人类算法由“生化算法”向“数据算法”的转变，我们不仅要传统的实体思维过渡到信息思维，而且要从信息思维过渡到智慧思维。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正是解放思想的动力。在“人民幸福”的边界内推进人工智能的大发展，促进人机共生，驾驭数字以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新算法，会成为智慧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正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一招。

总之，在致力于智能科技创新的中国，人工智能扮演着为增进民生福祉服务的工具理性角色；我们需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

① 高奇琦：《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第81页。

② 参见叶青：《人工智能应用落地要有真实可见的案例》，《科技日报》2019年10月25日。

③ 何明升：《智慧社会：概念、样貌及理论难点》，《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第41页。

活方式”。^① 这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人工智能增进民生“善”的价值取向。憧憬未来，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推进“人工智能+民生改善”模式，加快数字红利和智能红利的释放，摒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鸿沟”和数字贫困生产方式，促进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纵深发展，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望提供有广度、有深度和有温度的智慧支撑。

（责任编辑：周勤勤 洪欣）

On People's Livelihood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 Mi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rofoundly changed people's way of living and existence, and has a dual impact on people's livelih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livelihood eth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lead to many "evils" of people's livelihood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which can serve as a topic of realistic and potential ethical criticism. However, starting with dialectical thinking,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intensify the "goodness" of livelihood by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social system,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chang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increasing free time.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used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and promote the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reby bringing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to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national good governance and smart society. This can improve the "good" situation of livelihood, and contribute Oriental wisdom to solving the ethical dilemm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romoting people's good life paradigm.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vils" of people's livelihood; "goodness" of people's livelihood; Chinese wisdom

^① 习近平：《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日。